

【编者的话】

岁末年初，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引发热议，这场涉及诸多重要问题的大讨论至今仍在进行中。从本期起，1510 周刊将用三期的篇幅，依次解剖讨论中的三大议题。

本期先说民主与素质。韩寒认为，国民素质并不影响民主的到来，但会影响民主的质量。而正是因为对民主质量的担忧，韩寒说他不相信革命，而宁可期待改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论："素质"究竟是不是民主的前提？民主的质量和公民的素质究竟有没有相关性？



对于这两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王建勋认为，变革的关键是人们的团结一致，每个人都付出，而不是只有少部分人行动，大部分人只等着搭便车。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承担责任的意识，而不能一味想着别人为自己牺牲。在他看来，所谓"素质"，指的是人们的民主精神，承担责任的精神。而当今中国，爱自由胜于爱财富、胜于爱权力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他说自己比韩寒更悲观。

怎样才能使得人们具有民主的精神，爱自由胜于爱权力、爱财富？杨恒均说，这必须得靠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素质诞生于公民与专制制度决裂之时，而它需要在民主制度之中，才能健康成长。

为了探究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我们不妨考察他国的情况。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讨论了两个不同的民主案例。泰国的民主导致政局动荡，周方冶认为根源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在威权政治向民主制度转型时，还遗留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便为现在的政局动荡埋下伏笔。将视野拉回到中华民族的民主，第一个浮现的必然是台湾。但张铁志说，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以前的政府机关办事也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改变发生在民选开始之后，市长为了迎合选民，便大力改革，让政府真正做到"为民服务"。正是这种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得台湾有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建立了良好的公民素质。

台湾的进步告诉我们，要跑步必须得先解开脚镣。在本期周刊的最后一部分，刘瑜写道，"正因为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更应该……"破破的桥认为，我们需要的民主，不一定要能把"好官"选上去，只要能把"坏官"选下来即可，凭借一个正常成年人的素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蔡定剑教授则通过缜密的研究指出，要将选举和利益联系起来，当选民们知道自己的投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时，他们便会积极参加选举，这当中并无所谓"素质"的影响。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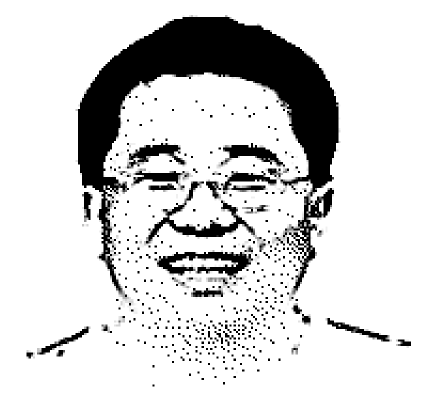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惑】

7-1 王建勋：变革、民情及个体责任——有感于韩寒博文引发的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讲，变革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在专制社会里，少数之所以能够通知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多数经常不能克服搭便车，进而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采取行动，而自己享受胜利果实，不想付出一点代价，变革就很难了。”

韩寒的几篇博文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对其看法，我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譬如，他说“人民就是体制本身”，就有一定道理。很多人喜欢谴责“体制”，其实，“体制”的运作靠什么？还不是靠一大批人的支持和帮助，它不会自动运转。指望一群既痛骂体制又疯狂考公务员的人改变社会怎么可能？

韩寒指责了国人的“素质”，这让一些人感到郁闷，原因之一在于当权者也常以素质为由拒绝民主。其实，如果我们把“素质”这个词换成托克维尔的“民情”，恐怕不必郁闷。

托氏说，维系美国民主的因素有三：地理环境、法律制度、民情，但民情是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化变革恐怕离不开民情的支持。

在托克维尔看来，如果民众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学会用民主的方式处理问题，纵使有民主的形式，也不会有民主的精神。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或许需从最小的共同体——家庭开始。请问在中国的家庭中，有多少父母尊重孩子和伴侣的自由和独立？有多少家庭具有自由和民主的氛围？

就拿美国来说吧，很多人以为其转型是从独立宣言或者 1787 年宪法开始的，其实，美国的变化在 150 多年的殖民地中已经埋下了种子，尤其是在 18 世纪里，美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看来，是根本性的、激进的变化，家庭、雇佣关系等都渗透了共和、民主的精神。

有人说，美国革命时期民众的素质能比今天国人的素质强么？这取决于“素质”是什么。

如果素质意味着当时那些国富们以及一大批人的政治理论水准，以及当时美国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共和、民主精神，还真不好说。《联邦党人文集》发表于当时的报纸，请问今天有多少国人（包括学者）能理解其精髓？

制度变革需要观念先行，如果民众不理解自由、民主的真义，或者不懂得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即使采取了行动，结果也会事与愿违。但在这个偌大国家，有多少人清楚土地私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有多少人民百联邦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重要性？有多少人同意阻止政府“免费”提供教育、医疗等物品？

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再推卸责任给“体制”或者“社会”这些概念，并且拒绝成为恶之帮凶的时候，良性的变革才有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进行积极的反抗，至少应当做到消极不合作。如果这点都做不到，或者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愿作出半点牺牲，变革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在很大程度上讲，变革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在专制社会里，少数之所以能够通知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多数经常不能克服搭便车，进而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采取行动，而自己享受胜利果实，不想付出一点代价，变革就很难了。

我经常说：“如果你将来做了法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违反争议的判决，哪怕面临着辞职甚至自杀的选择。因为既然你选择了法官，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捍卫正义，当事人的生命

财产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尽管有人赞成，但也有人觉得此要求太高。请问对一个追求法治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高吗？

我经常在课堂上讲因果伟大法官库克（Sir Edward Coke）的故事。他冒着下狱的危险争取司法独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斗争。英国之所以较早确立法治，是由于英国历史上存在一大批库克这样的法官，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正义而战。而中国的法官呢？如果谁这么做，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恐怕会觉得他是傻冒一个。

有人说，美国革命时还保留奴隶制，妇女也没有投票权，人们的素质恐怕远不如今日的国人。

的确，美国的黑人、妇女等都曾长期遭受白人男性歧视。但今天的中国如何？城市人不歧视农村人？汉族人不歧视非汉族人？男人不歧视妇女？不说别的，多少市民不反对放开户口？不反对打工子弟在城市高考？

别一听他人说“素质”就跳起来。

今天的国人有多少爱自由胜过爱面包、房子和好车？有多少人爱自由胜过爱平等（尤其是“财富平等”）？有多少人爱自由胜过爱权力？一位历史学家曾经研究为何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欧陆、中国或者印度，发现当时英国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等）远高于他地。

韩寒对“革命”的微词，遭大力挞伐。笼统地讨论“革命”确实极易引起误解，因为大家并非在同一语义上使用该词。这不仅仅源于理论家的众说纷纭，而且源于经验世界的复杂多样。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都叫“革命”，但其内容、方式和结果大相径庭，怎么能笼统地说支持还是反对革命？

如果你支持“革命”，你支持法国革命、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吗？

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反对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辛亥革命吗？

看来，笼统地说支持或者反对革命，都会让人误解。还是先把你对“革命”的理解弄清楚，才下判断不迟。否则的话，争论不过是鸡同鸭讲。



“革命”一词约在十五世纪里就有了社会秩序剧烈变化的意思。1688 年之后，其在政治领域的使用普遍化，但人们对“革命”的界定五花八门。

譬如，学者 Jeff Goodwin 将革命定义为”一个国家。或者政权被推翻并因此由非正常的、超越宪法的以及（或者）以暴力形式发生的群众运动带来的任何根本性改变。据不同标准，“革命”被分为：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科学革命等。

托克维尔区分了三种革命：

1，政治革命；

2，不仅寻求政治变化而且改造整个社会的突然和暴力的革命；

3，缓慢但全面的社会变革。

他基本支持第一、三种革命，反对第二种革命。

预测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没多大意义，除非你是个预言家（或者致力于成为一个），或者相信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变迁充满了偶然，而且往往不是线性的，更不存在“进步”的必然。那些语言若中国发生革命则结果必好或者必坏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随便说说还行。

有朋友关心我对未来中国的“猜想”，我比韩寒还悲观，甚至比我的绝大多数师友都悲观。

悲观的原因之一在于我比较理想主义，期望未来中国不仅在形式上是自由民主的（确立普选等），而且在骨子里也是如此，自由民主的精神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而这一天的到来恐怕要以世纪来计，但应有希望。

有人认为今天比 100 年前的中国“进步”不少，我不敢苟同，如果这种进步指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话。



读读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历史就知道，那时候人们的很多自由和权利都比现在更有保障，政府的权力比现在有限得多。看看那时的报刊，就知道当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比今天大得多。

今天的教科书里倾向于丑化 100 年前的中国，责难其贿选、军阀割据等。其实，那个时代比现在强多了。不说别的，就拿 1921 年《湖南省宪法》制定来说吧，该宪法起草完毕之后，由湖南省民众投票表决通过。今天可以想象吗？这部宪法里居然还规定了公民的持枪权，恐怕今天很多人也会撇嘴嘲笑。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12/201112280006.shtml）

【返回目录】



7-2 杨恒均：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 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 1945 年以及 100 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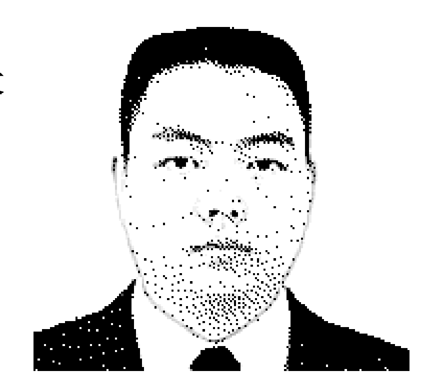
（杨恒均：作家，时事评论家。 原文链接：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0102125052470/）

【返回目录】

【观】

7-3 周方治：泰国：奇特的民主，熟悉的困境

“多达七成的农村民众，长期无法分享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红利。这也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会给予他信坚定支持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信提出并切实兑现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草根经济政策’。”



泰国的问题虽有其独特性，但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却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对的难题。

4 月 13 日是泰国新年——宋干节（泼水节）庆典的第一天。但是，原本应当充满喜悦与祥和的曼谷街头，今年却充斥着动荡、紧张、沮丧的负面情绪，甚至还弥漫着难以拭去的硝烟与血腥。

从 4 月 8 日起，到 4 月 14 日止，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发动了名为“红遍天下”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集会，并迅速演化为街头暴力，攻占内政部，围攻总理座车，甚至冲击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会场，最终导致峰会被迫取消。

尽管从目前来看，红衫军已偃旗息鼓，部分领导人也已投案自首，但是，泰国政坛的火药味却浓烈依旧，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政局将会就此平息。



从 2006 年的军事政变，到 2008 年的“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攻占国际机场，再到 2009 年的红衫军破坏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泰国在历时 3 年的政治动荡之中，不仅失去了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而且也毁弃了多年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反复动荡的根源何在？

实际上，动荡反复，但政治公式却是不变的：要想在泰国执政，首先需要取得三方势力---传统王权、军人集团、地方政客---的政治背书，否则势必难以维系稳定的政局。这在三位前总理他信、沙玛、颂猜相继被迫下台的经历之中，已然得到反复的印证，而现总理阿披实，显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泰王：来自小乘佛教的权威不可挑战

尽管在 1932 年的民主革命之后，曾是前现代社会唯一政治权威的传统王权已丧失了独尊地位，而且在随后的近 30 年间，一直受到来自军人集团的政治压制。陆军元帅披汶.颂堪在其长达 15 年的总理执政（1938 年~1944 年第一任期，1948 年~1957 年第二任期）期间，始终奉行对传统王权与保皇派的打压策略。

这位曾亲自指挥 1933 年平定保皇派武装叛乱之战的军方强人，甚至公开宣称，“日本人有天皇作为他们明确的指导原则，我们没有。我们拥有的是国家、宗教、国王与宪法。国家依然是一个理想；宗教未被虔诚地奉行；国王还是个孩子，只能在画面上见到；宪法只是一纸文件。当国家处于危急状况之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因此，我要求你们追随总理。”

不过，随着陆军元帅沙立.他纳叻于 1959 年出任总理后，军人集团对于传统王权的态度，从压制转向扶持。民主革命前的立国三原则“国家、宗教、国王”，再次成为政府的行动指针，年轻的拉玛九世也随之成为泰国的象征，传统王权焕发生机，重新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

值得留意的是，60 年代以来依托军人集团的支持而复兴的传统王权，其政治权威的来源，并不完全是阿育陀耶王朝（1349 年~1767 年）所盛行的婆罗门教” 神王思想”，而更多

的是素可泰王朝（1238 年~1350 年）所盛行的小乘佛教"法王思想"。前者强调国王血统的高贵和生而具有的神性，属于"君权神授" 范畴；后者强调国王的德才兼备，行为切合佛法正道的义理，属于"贤人治国"范畴。

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1927 年）国王，以其贤明的才干和仁慈的品行，充分诠释了"法王"的概念，从而赢得了泰国民众的真心拥戴。这位足迹曾遍布泰国各处边远山区和贫困农村的"农民国王"，至今在老一辈中下层民众中依然拥有无可亵渎的尊荣。正是这种崇高的个人威望，使得拉玛九世能够在 1973 年、1992 年以及 2006 年的政治动荡中，超越宪法框架，发挥关键性作用，平息紧张事态。

尽管"法王"权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性，既难以让度，也无法承传，随着下一任国王的继任，传统王权的政治权威或许就将步入历史的尘埃，但从目前来看，拉玛九世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不容任何人挑战。

军人集团：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

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最初源于 1932 年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的功勋。随后，通过 30 年代对文官左派和保皇派的镇压，二战期间与日军的妥协，以及冷战期间与美军的合作，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逐渐上升，甚至一度凌驾于宪法框架之上。越战期间，沙立.他纳叻元帅（1959 年~1963 年执政）及其后继者他侬. 吉滴卡宗元帅（1963 年~1973 年执政），以维护传统、防范共产主义以及推动国家发展为由，取缔政党，废除选举，推行所谓的"泰式民主"，将传统王权的神圣性与军人集团的暴力性相结合，构成了二元一体的政治权威，从而排斥了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

对此，沙立曾将"要东方的仁慈家长专制，不要西方的无效民主"观点，形象地比喻道，"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就像一棵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在泰国的土壤之中。它应该在风吹雨打中成长，应该结出香蕉、芒果、红毛丹、山竹果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海枣、李子或栗子。"

1992 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坛，但是，其政治权威却并未随之消散，而是试图以间接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一方面，不少军方高层离开军队组建政党，利用军人集团的社会资源（包括陆军电台和银行等）和人脉，参与选举竞争。差瓦立.永猜裕将军（1996 年~1997 年执政）领导的军方背景的新希望党，更是一度牵头组阁。另一方面，包括前总理炳.廷素拉暖将军（1980 年~1988 年执政）在内的不少军方高层，则加入拉玛九世的顾问机构---枢密院，成为联结军人集团与传统王权的牢固纽带，发挥着“1+1＞2”的政治作用。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军人集团始终坚守军队的独立地位，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权，都排斥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从而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使得国家暴力机器成为军人集团借以维系政治权威的质押物。

无论是 2006 年发动军事政变，还是 2008 年放任黄衫军封锁国际机场，抑或是 2009 年威慑红衫军运动，都充分体现了军人集团在政坛的决定性影响力。

不过，也要看到，随着 90 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民主意识的传播，军人集团直接干政的政治权威已远不如前。《1992 年宪法修正案》增补的有关“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议员”的规定，更是深入民心，从而彻底阻断了军方通过政变实现长期执政的可能。2006 年的军事政变后，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压力来看，限期“还政于民”都成为军方唯一的可行选择。

地方政客：更多是“钱主”而非“民主”

地方政客的政治影响力是在 1932 年民主革命之后，随着民选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不过，直到 50 年代末，地方政客都未能成为独立的政治权威，而是长期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军人集团。60 年代，地方政客的影响力，更是随着民主选举的停止而陷入谷底。



1973 年“十·十四”民主运动之后，伴随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民选体制的地位得到巩固，地方政客也由此独立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90 年代以来，地方政客更是取代军人集团，成为泰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客的政治权威虽然源于民选制度，但从本质来看，其所体现的更多是“钱主”，而不是“民主”。

长期以来，贿选问题一直是泰国社会所深恶痛绝但却屡禁不止的顽症。虽然自《1997 年宪法》以来，泰国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并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公正选举的监督，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泰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体系不瓦解，那么传统的村社权威就依然能够一如既往地扮演“票头”的角色。

20 年前，曾有泰国学者如此描述：“竞选时要分区负责，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

时至今日，情况依旧，所不同的仅在于贿选的手法更加隐蔽，更具有技巧性。2008 年，他信派系的人民力量党被宪法法院判决取缔，尽管存在明显的政治斗争因素，但其旗下议员的贿选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于传统王权和军人集团，地方政客从来都不是具有内聚力的整体概念，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从大土地所有者，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团，再到新兴（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甚至尖锐对立。

由于缺乏广泛的共同利益，泰国的政党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亲缘、学缘、地缘为基点，依托传统庇护制网络构建的地方政客松散联合体。其常见范式是“政党主席－民选议员－地方票头－选票”的多层级庇护制链状结构，任何利益分配的变动，都有可能引起层级结构中庇护制链条的断裂，从而导致政党的瓦解与衰亡。



对此，泰国学者曾讽刺说，“政客就像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这也正是 80 年代以来，泰国政坛始终难以摆脱小党林立格局的根本原因。

值得留意的是，“电信大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泰国第一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尝试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庇护制政党的发展道路。

通过“草根经济”的扶贫政策和媒体网络的轰炸宣传，他信试图缩短原有的多层级庇护制链条，构建“政党主席－选票”的扁平化结构，从而巩固政党的稳定性。实践证明，他信的计划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在 2005 年的大选中，使得泰爱泰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民选国会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而且也使自己成为泰国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

但是，作为新兴产业集团的代表，他信派系的迅速扩张，已严重冲击了原有格局之下的各派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代表其他社会势力的地方政客派系，还是传统王权与军人集团，都面临边缘化的威胁。于是，从 2006 年起，围绕他信派系去留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展开。

城乡严重分化，泰国陷入“缪尔达尔困境”

反他信的黄衫军与挺他信的红衫军，都已通过街头暴力的方式，充分印证了自身对政治局势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那么，被普遍认为代表曼谷城市中产阶级的黄衫军，与代表外府农村地区民众的红衫军，为何会在他信问题上存在如此针锋相对的观念？

或许，从泰国严重的城乡分化现象中，不难得到答案。

依托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泰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迅速实现了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1 年的 30.6 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2446 亿美元，而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 115 美元增长到 3720 美元，增长了 30 多倍。

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担忧的，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因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制造业产品中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使得城市中有机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提高，而农村中未能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则会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由此，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村民众，就将被城市的现代化拒之门外，长期徘徊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困境之中。

现今的泰国，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正是缪尔达尔所担忧的发展困境。多达七成的农村民众，长期无法分享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红利。这也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会给予他信坚定支持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信提出并切实兑现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草根经济"政策。事实上，红衫军在"红遍天下"运动中的重要政治诉求之一，就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他信支持者对于他信在农村地区选民支持率的充分自信。

虽然他信的农村发展政策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泰国所拥有的发展资源并不充裕，因此在增加农村地区投入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与投入。早在他信执政的第一任期，就曾试图削减曼谷的地铁建设项目投资，但后来迫于压力而放弃。面对国家发展资源的分配难题，他信的基本策略倾向是"放弃城市，固守农村"，试图借助新兴产业资本集团（资金优势）与农村民众（选票优势）的联盟，利用民选政治的多数决原则，通过国会的选举掌握国家权力。

不过，事实证明，他信还是误判了政治形势，过于信任宪政框架下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而低估了在多元政治权威之下，城市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乎，从 2008 年黄衫军围攻国际机场，最终导致人民力量党下台之后。他信派系的政治斗争也走向了国会斗争（为泰党）与街头斗争（红衫军）相结合的道路，结果使得泰国政局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



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问题如何解决

泰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泰国政治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多元政治权威的并存。这就使得各方都有动摇政府根基的能力，政治僵局难以通过单一途径——威权体制下的军事政变，或是民主体制下的民主选举——得到化解，唯有诉诸长期的各方博弈与妥协。

其次是城乡差距所造成的政治诉求对立，使得政府在有限的国家发展资源分配方面陷入两难。阿披实执政后，试图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一方面确保农村民众继续享有他信时期的福利补贴，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福利以安抚曼谷中产阶级，但问题在于，面对全球经济的萧条，外向型的泰国经济的衰退似乎难以避免，那么，即使阿披实顺利度过此次的他信"绝地反击"，未来如何协调已被他信挑起的"政治化"了的城乡矛盾，依然是无可回避的难题。

泰国的问题虽有其独特性，但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却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对的难题。相比之下，由于政治现代化快速演进而导致的多元政治权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统权威人士的过世，或许还较为容易化解；而由于经济现代化跨越式升级所遗留的城乡差距问题，则至今依然看不到化解的途径。

日本与韩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开放，通过工业化外溢效应，有效地化解了城乡差距问题，但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再复制这一过程。那么，未来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或许不仅是已经陷入困局的泰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周方治：中国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406）

【返回目录】



7-4 张铁志：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在民主社会中，会有比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相对的，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因为社会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谎言，且规范社会秩序的规则不透明，充满了潜规则，所以社会信任度很低。社会信任度低当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公民素质。”



总是听到来台湾的大陆朋友说起台湾的美好：城市干净、排队秩序井然、人们彼此斯文有礼、乐用环保餐具并认真回收垃圾。在开放台湾自由行后，大陆朋友可以在阿里山和日月潭的小巷弄中，在更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发现这些美好。

对许多大陆人来说，台湾体现了中国文化或传统道德美好的一面，而他们痛恨这些美好的东西被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所磨灭或摧毁。

常常大陆人把台湾说得好到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台湾人也常常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与厌恶，也仍然不时觉得这个城市丑陋而脏乱，并偶尔也会遇到恶意以对的路人或试图诈骗的商家。

但台湾也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台湾人这些优良的公民素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当然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关，但或许，这更是二十多年来台湾民主化的产物。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确实隐含了以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底蕴。例如理性、温和，以及更重要的，对人的尊重。民主的根本价值，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例如，过去台湾民众去公务机关办事，官僚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柜台都是高不可攀。但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上任后便开始大力改革这个文化，降低民众洽

公柜台的高度，且必须为民众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对人的尊重不仅存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也存在于公民彼此之间。所以，在民主社会中，会有比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相对的，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因为社会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谎言，且规范社会秩序的规则不透明，充满了潜规则，所以社会信任度很低。社会信任度低当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公民素质。

民主社会也可能让公民更遵守某种公共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基于自愿服从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毕竟，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每个人选择之后，服从大家的集体决定。更进一步说，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会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而不会自扫门前雪。例如，台湾的小区运动就是开始于民主化后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许多基层小区区民开始一起关心小区的历史、文化与风貌改造。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有管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民主也让在经济发展下被牺牲的原则（如环境保护）可以有被伸张的机会。民众在面对经济开发与环境污染时，他们可以选择要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要靠他们的价值选择。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公共讨论后，会让民众重新省思 GDP 主义，而不再只是急切地追求发展。

理想上，民主尊重缓慢的原则，因为要让所有受影响的人有表达的机会，然后大家沟通、讨论、决策，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而缓慢，似乎正是许多人对台湾的印象。

总之，当自由行的大陆朋友踏上台湾的土地，被这个地方的美好人情与公民素质感动时，请记住，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当然，台湾还有许多缺陷，距离民主的终极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还在努力。

（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原文链接：http://www.peopo.org/rousseau/post/86488）

【返回目录】



【议】

7-5 刘瑜：素什么质

“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



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 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 2009 年研究显示，中国 18.3%的 25-34 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 48 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铸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



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银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银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811）

【返回目录】

7-6 bridgeduan：评韩寒：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



“民主制度是套利益分配模式，其制度运转的基础，是假设每个正常的成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利益所在。所以民主制度的底线素质要求是很低的，只要不是白痴的成年人就可以。”

前些日子韩寒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其中大量文字涉及中国人素质方面的探讨。本文由新浪@破破的桥 撰写，对“民主素质论”一说略作拆解和讨论。由于内容很多，博客体裁篇幅无法容纳，本文多谈观点和结论，少做论证。

一、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重视？

首先，韩寒人气很高，以青年意见领袖的形象出现，谈论政治；其次，文章非韩寒个人看法，而是表达目前中产阶级的主流态度——对民主改良进程并不看好，对底层革命后果十分担忧；再次，这几年将是中国前途的十字路口，相关讨论会逐步升温。

从文章内容来看，思想观念并不新奇。韩寒主要表述了目前左右翼保守端的态度，很多人对当今中国的左右分歧比较熟悉，但并不清楚保守和激进派系的分歧，也不了解南方系的右翼保守立场，所以会惊讶：啊，某些环球时报编辑和南方系主笔都赞成韩寒？意见和谐得能开新年派对了。韩寒文章遭遇的批评则主要来自于激进端。当然，因其影响力，各方也会有意对其误读来扩大己方基本盘，不冗述。



二、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批评？

1.文章本身有不少逻辑、内容和概念错误。考虑到韩寒是作家而非政治学者，提出问题和表达观感即可，不值得一一辨析。值得讨论的是这些看法的思想来源。

2.网络平台是平等的，虽然话语权有区别，但谁也不能豁免批评，韩寒作为高帅富也一样。道理大家都明白，接受现实有点难。

3.网民的平均智力水平在不断上网，观点碰撞的过程中提高了。

4.韩寒文章是种对现实状况的描述和期盼，表达个人的保守观点。这种观点是否获得支持，与现状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在 5，6 年前，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会很赞同。但这几年体制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民间乐观情绪逐渐消退，悲观和暴戾情绪逐渐上扬，受到的批评大幅增多也就不足为怪。

三、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韩寒的素质论和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民主”有所区别，他的论述集中在素质是否影响民主质量，文中主谈两类素质，第一类是“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的素质；第二类是“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的素质；我再补上韩寒没说，但是大家常讲的另外两类，第三类：民众代表和民主追求者的素质。第四类：民众在公共政策上的决策素质。

1.需要“开车交会时关掉远光灯”的素质么？

第一类素质指向道德领域，开车交会是否关掉远光灯（因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表明你能否尊重他人的私利，是否尊重他人。然而它对民主制度影响甚小。民主制度，是一套行使权力的模式，追求民主，则是权力模式变更的过程。即便大家都学会关远光灯，权力还是权力，不会因此而丧失一分一毫。其作用在民主制度运作中相当可疑。美国，球赛散场，往往一



地的矿泉水瓶；公交地铁，常常见到烟蒂；开车交会那毫无疑问也有人不关远光灯。但它的民主运作，似乎并不比公共道德更好的欧洲日本要差。在美国的朋友都清楚，小城镇车让人，曼哈顿这类大城市则常有蛮横司机。但未见得纽约的民主就比小城镇差。而纳粹则恰恰在欧洲个人素质最高的德国发扬光大。

民主是一套政治运作的制度，人们对这套制度的了解，和运作这套制度的行为，才需要作为“素质”关注。其它“素质”，与民主制度是否良好运作，关系并不明确。

2.民众具备“补足了钱就满意”的低素质怎么办？

第二类素质指向价值观念。韩寒叹道：“很多人倒霉到自己头上才想起来上访，捡起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反对这个制度时，往往是利益驱动。当利益和价值相符，就会表现得认同民主自由公正这些价值观念。而当利益被满足以后，便不再追求价值。如果现行体制能满足其利益，则会反过来维护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用革命获取民主是困难的，民主即便实现，其质量也是低劣的。

中国很多名人表述过类似观点，如胡适说，追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龙应台则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直批台湾人在维护价值理念时的懦弱自私。

可很有趣的是，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也表达过非常类似的观点。华盛顿对国会抱怨说：独立战争我军休整时，因军费支出太高，刚发行的美元三年贬值了三倍，结果拿美元买不到粮食，各地农民都卖英军粮食。美利坚的公民们，难道除了钱就没有任何追求了么？个个都争当美奸。这素质实在太低了吧？至于探讨美国政治的最知名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众的评论，那根本不用摘录了，简直就是两百年前的韩寒。

我们回到韩寒的问题上来。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念，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不可或缺。只有对这套价值观念的追求，才能让权力来源由君主变为民众，让大众参与政治，才能找到让民众充分知情，平等投票，有效参与的制度模式。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纯粹为利益斗争，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只能导致朝代循环和军阀乱战。



但是，在各国民主化之前与民主初期，大众对民主价值观念冷感，或不愿支付成本去追求的心态，非常普遍。《独立宣言》是美国建国最重要的文本，里头的名句人人皆知："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但当今的社会批评家若出生在那个时代，便可以好好嘲笑这段话：你看看，妇女、黑人、印第安人、奴隶，有的没有选举权，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即便在比例已经很小的公民里，也只有不到一半才有投票权，无产者还不能投票。连起草《独立宣言》的某些作者都蓄奴，这一切居然被美国公民们堂而皇之的接受。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妄想实现民主、人人平等，岂不是既虚伪又好笑么？

诚然，没有这些社会意识作为根基，民主制度是虚浮而不稳定的。然而基本没有国家能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根基牢固，因为专制者并不会让这一切出现，民主意识的根深叶茂都是在民主化之后。民主化之前，往往仅有少量的国民具备基本的民主意识，其中更是只有很小比例愿意为此支付较大的成本。所幸的是，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要路径正确，依然足以动摇专制的根本。在权力结构的变动中，大部分国民是搭车者——他们并不排斥甚至向往民主，只是不愿支付成本；甚至可能是被裹挟者——他们对民主自由并没有追求，但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在旧制度下崩溃而不得不转向新制度。

韩寒的说法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追求者而言，什么样的追求路径更容易达到目标？在追求民主过程中，我们可将旧制度下利益受损的人群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领头者，他们愿意为社会变革支付较大的成本，包括大量的财产损失或人身安全。我们可以假设其比例是千分之一。

第二类是跟随者，他们内心接受和向往民主制度，但只愿意支付较小的成本，包括少量的财产损失或被骚扰。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占百分之五。

第三类是观望者，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意识到了，但却不愿意为改变社会状况而支付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这是百分之九十的大众。

剩下的是旧制度的获利者或特权群体。



合理的推断是，如果履行或追求某种民主权利，所需的成本，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被第二类的“跟随者”群体所负担，那么就更可能是一条合适的路径。相反，如果过度寄望于群体很小的“领头羊”，或者国民大众，那么往往事倍功半，难以推进。例如近期很热闹的独立参选，很多宣传者抱怨道：如果一部分在网上发空炮的人能够站出来参选，每个中国人都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那么哪怕在这种完全不公平的选举制度下，也能一步步实现民主。毫无疑问，这失败原因，是大家没有选举意识，民主素质太低了。但此时你要问一句：这条路径，实现的前提存在么？

根据三类人群的分析方法，你就可以知道，独立参选模式导向民主的路径是艰难甚至行不通的。它需要足够大的群体，也就是那“网上放空炮”的第二类人，来担负第一类人的职责——当候选人，支付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制作选举海报，挨家挨户宣传，顶着官僚机构的骚扰，冒着人身安全和前途的风险。它还需要一个比这更大的群体，“每个中国人”，也就是第三类人，来担负第二类人的职责——做有责任的选民，了解候选人信息，冒着被老板被领导骂的风险，来投这一票。这条路径成功所需的人数前提，是违背客观规律，永远无法保障的，因此三十年来独立参选运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3.民众代表和民主派的素质？

另一观念是，作为代议者，民众代表和民主派自己素质要高，如果民主派自己都相互责骂、攻击，一点“民主的态度也没有，那上了台就会更专制，还不如目前的专制呢”。注意最后那句很多类似论调的要点和共同点。

此观点仅作如下拆解：

无论民主派也好，民众代表也好，专制者也好，其整体平均素质是由本国人素质决定的。在同一国家，并不存在低素质民主与高素质专制的比较。被权力侵蚀的专制者与中、底层的官僚机构，只会比平均的国民素质更差。其好形象多半由宣传部门的谎言包装而成。若在低素质国家欲行高素质的专制，逻辑上逃不出从高素质国家聘请国外的“高素质专制者”，先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必然结论。



与民主过程相关的素质，是指代表者的代表性，与对民主议程的尊重，而非私德。马丁路德金爱好嫖妓，演讲剽窃，并不影响他做民意领袖。而这些代表的素质，在民主实行初期甚至民主前，也很难高起来。各国各地议会运行初期的斗殴是司空见惯，台湾议员打架打到住院央视年年播得风生水起，就不多提了。各国均不缺这一传统活动，18 世纪，早期英国议会中决斗盛行，以至于要把反对政党的座席分开焊死，避免这群武林高手操起椅子互殴。1798 年，美国国会中两州的代表 Griswold 和 Lyon 使用了手杖和火钳作为武器，在国会现场进行了对决。当然韩国更为夸张，一个多月前，韩国在野党议员向国会主席台投掷了催泪弹。日本人相对比较古板有礼一些，他们只是在东京都议会的议员选举投票中，让著名的爱情动作片女优，德艺双馨的后藤麻衣老师，获得了 3600 票而已。

完美主义者会感叹：这些国家的民主派真虚伪阴狠，他们骨子里才是真独裁，掌权后只能更专制，连不同意见都容不下而要动手，迟早再来一次革命治乱循环，民主后杀全家。然而，最终你可以发现，这些“低素质行为”确实会降低民主的效率和质量，却并不会导向专制。会导向专制的可能性只会出在：(1).某个集团或某个人试图对权力进行垄断。(2).对民众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只要是做这两点的，哪怕执行者和鼓吹者是以高素质的救世主形象出现，结果都一样会通向奴役之路。

4.民众需要什么素质？

民主制度是套利益分配模式，其制度运转的基础，是假设每个正常的成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利益所在。所以民主制度的底线素质要求是很低的，只要不是白痴的成年人就可以。当然，公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参与越深，则好处会更大。韩寒文中提到马化腾撒 Q 币就会有几亿张选票，只是比喻，不过这在较完备的制度设计下极少出现，因为即便当选，因权力受监督，大规模的贿选很难收回成本。倒很容易发生在行政权力依然运作于专制体制的情况下，若无法监督权力，仅靠一套选举程序无法达到民主，只能帮每个公民多要一堆 Q 币回来，当然，这也是初级民主相对于纯粹的专制体制的收益了。

有人说，候选人个个说的天花乱坠，老实巴交的选民素质不够，很容易被骗，还不如专制呢。这种说法忽视了民主制度下最低档的好处，投票作为一个纠错程序而存在，就是能够把已知的，在台上的糟糕执政者选下来，而不是挑选出最好的人选选上去。专制制度下，哪怕一群

贪官贪到全城皆知，群众给纪委和检察院的举报信堆得能烧一冬天炉子，高档饭店洗浴中心天上人间外头都是公车军车，还带病步步高升，你也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

官员未执政时，议员未代议时，政策未实施时，好不好你需要知识和经验去判断。但官员上台后，议员履职后，政策实施后，结果好不好，是否代表你，是否损及你的利益，只要不是白痴，都一清二楚。所以你很容易将坏的官员踢下来。而要进一步选出你满意的官员和议员，争取有利于你的政策，其准确度与民众素质是相关的，必须在民主制度运转中逐步学习。

四、革命、改良与争自由

1.革命该来就会来

革命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它不需要群众什么素质、勇气，在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革命是权力结构的突发性变更和置换，在旧社会和旧制度崩溃的同时出现。所谓是否”需要革命”这个讨论是相当蛋疼的，判断革命好不好，对阻止革命发生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在平常你可以考虑吃肉好还是吃菜好，但在快饿死的时候，就是被人踩过的窝头你也得吃。革命是否暴力和血腥，取决于多个方面，例如旧制度和专制者的顽抗精神，革命者自身的目标、组织结构和素质等。

有个较流行的说法，叫改良和革命赛跑。其实改良只是在和社会现状赛跑。当支撑社会稳定的几个基点发生溃烂，比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生态危机时，旧体制就会崩溃，革命便会产生。中国当前体制的特点是存在一个自利型的官僚集团，它们不断抽取社会财富和资源用于自肥。随掠夺的时间增加，危机也就日深，这现状是不可持续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革命初期的原子状态，如果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长，超过某个维稳能力的上限后，就会爆发式增长，出现失控状态，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革命。

我觉得韩寒对于”暴民革命”的恐惧是延续某些知识分子的看法，而它们的看法往往落实在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左右翼的保守派将 49 年的悲剧解读为：某个群体依靠土地革命

给农民群体许诺利益，然后用底层的"均富"需求将这些农民改造为暴民，夺取了政权，造成了几十年的动荡和悲剧。然而这个解读并不能轻易接受，放到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下看，苏联渗透了与之地缘相关的几十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但它们夺取权力的模式并不相同，很多国家并没有任何土地革命，同样也夺取了政权，无一例外。而建政后，并没有组织红卫兵搞文革，却也发生了相似的悲剧。其夺取胜利的秘密，更像是苏联所创造的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战斗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发生的悲剧，包括执政党内部清洗，民众普遍丧失自由等情况，其原因，也是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本质所致。而不是什么"暴民政治"。

革命是否会造成"恶性循环"？这关键是看革命者（革命团体）能否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将革命仅限于打碎原有的权力结构中限制自身自由的枷锁，而不将革命所获的权力去作为限制别人自由的枷锁。能做到这点的革命，就不会产生"继续革命"，而不能做到的，甚至革命本身目标就是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无论革命的过程是否暴力，都会"恶性循环"。

判断革命团体成功以后，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这是个技术活，可参考拙作：《什么是好的政治承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0qh4v.html

2.维持现状和改良的成本

很多人会嘲笑，你谈什么革命呢？你有枪么？但很少会对改良者嘲笑，你谈什么改良呢？连正厅级的官都不是，还谈改良？其实两者是一回事。谈论革命改良，首先将其作为求知范畴，而非社会运动来对待较好。这样你不会在讨论中产生焦虑感和无力感。

维持现状往往不是因为民众有保持现状的意愿，很可能是无力变革时的等待。需要知道的是，维持一个不公的现状是需要成本的。很多人之所以承认现状，是期待"民主化"以后，大杀贪官，把被剥夺的财富"夺回来"。但实际上很多财富流失是不可逆的，在不公正的制度下，每年都有无数的财富流失、转移、被洗白，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你已经无法判断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合法经营还是权力掠夺，也就无法找到公平补偿的模式。此时再用暴力做无差别的剥夺？那没有用，这时倒正应了韩寒的话了，最阴狠毒辣者，会在这个再分配过程中，获得最多。



改良同样也有成本，如果说革命是突发的权力结构转移和置换的过程，那么改良就是个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缓慢调整的过程。后者会对民众的承受力进行考验。为了减少改良的阻力，将来有一天如果对贪污一千万以下的官员全部赦免，你能么？你往往会问，凭什么？我租小屋他住别墅，我啃馒头他吃大餐，我看 AV 他包二奶。用的还都是我的税款。它贪一千万，可是有人的父母因为交不起几千块钱的大学学费，愧对儿女，上吊死了。他们怎么原谅？嘿嘿，你死撑着不原谅，利益集团可还觉得他们要价太低呢。即便很顺当地“改良”了（目前看来是基本不可能），这个过程和抉择也远远比你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3.改良的路径

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当前的改良目标，那么有如下几点你是需要了解的：

(1).在改良者的宣传中，往往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一条“双赢”之路。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而原有的掌权集团获得了安全，并试图说服掌权者主动改良。但简单思考，如果并不存在革命的可能性，那么后者是谎言。掌权集团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结果，应该是维稳，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并不存在什么双赢格局。对有权者而言，民主体制下丧失腐败等非法利益那就不提了，还会丧失包括特供、公车、疗养院等当前的合法利益，哪怕合法利益他们也不在乎，那丧失前呼后拥，动辄封路的特权快感，谁能体会从别人点头哈腰孝敬自己，到上门拜票累到腰椎间盘突出的感受呢？光这个落差，就足以让整个群体无法主动迈出体制改革的步子，哪怕集团里某些个体有此意愿，也无能为力。

而掌权者从体制改革所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坐牢”，“双规”这类无序的争斗减少而已，普通官员八辈子都轮不到一次。能吓唬谁？当前，只要遵守潜规则，贪的克制点，让所在的小团体利益均沾，风险是相当小的。

(2).改良成功的可能性，对应的是抗争者付出的代价。

很多人盼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台湾转型等“不流血”革命、改良，盼得脖子都长了。但很少去想，光荣革命的成果，国王的气焰，是贵族进攻伦敦，连绵内战打掉的，为了让国王逊

位，议会请的新国王可是带了一万多兵来的。似乎不付代价的权力变更，那只是其中一个瞬间。天鹅绒革命也是如此，它是很平和，但革命之前呢？发生了什么？台湾转型就更要问了，蒋经国开党禁、报禁，为什么开？是因为他“伟大”么？

(3).改良的关键词是主动。

改良是怎么发生的？很多人以为，是不断地向掌权者和民众灌输民主制度的好处，然后上层主动改革，或者下层请愿，上层退让，形成良性互动，然后体制改革就开始了（二十多年前，这种策略的简化版被称为“自杀救国”，说服掌权的利益集团自杀，国家得救了）。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但属于小概率事件，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凡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它总是符合墨菲定律，往最坏的情况走。所以建议不要对这种模式寄托过多的希望。没戏是意料之中，有戏是意外之喜。

现实的改良是如何发生的？大家可以参考 80 年代的投机倒把罪，这个罪名是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本意是打非法投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正常的商业活动均可入罪，所谓十商九罪，最高刑罚是死刑。这个罪名是 97 年左右才废除的，但早已名存实亡。原因很简单，利益所趋，挡不住那么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一起无视它，蔑视它。权力的来源是服从，当足够数量的人不再服从，权力也就不复存在。

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台湾人，要取消万恶的国民党的报禁，要言论自由，应该怎么办？应该向蒋总统“进谏”么？不是的，而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a.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先追求你个人的言论自由，有什么话，想办法说出来。

b.权力一定会来阻止你，想办法绕过它，它禁你的报，你就自己印，禁你的书，你就在地摊卖，封你的网络帐号，你就上大街到人多处举牌。当然，控制好行为风险，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c.找到其它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践行 a 和 b。

当践行这三条准则的人足够多的时候，权力的言论控制成本就到了它所不能负担的地步。此时，由于大家的不服从，报禁开不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蒋总统来说，开了还有个好

名声，不开也没法借信息垄断撒更多的谎了（反正也没人信了）。那么，报禁“自然”就开了。如果报禁还对他很有用，不管你怎么求，用处不大。台湾的党禁也是如此。

以上是我对韩寒三篇文章的简要评论，考虑到网文特征，做了很多删减。

附韩寒原文摘录：

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如果起义，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无法用 QQ 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

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 QQ 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 500Q 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

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

本文总结：

最简版总结 1：民主制度是权力参与和运作的模式，与其无关的素质并不重要。民众代表的素质是其代表性，与对议程的尊重，代表爱打架，不遵守规则，固执己见等，会影响民主质量，但不会导向专制。试图垄断权力才会专制。民众参与的最低素质，不是会选”好官”，而是能把”坏官”选下来，正常人即可做到。



最简版总结 2:连正厅级别没爬到的人，谈改良同样是空谈，仅有求知意义。在不公正制度下维持现状同样需要支付成本，有人幻想某日“民主化”以后，能把以前流失的财富“夺回来”，这是不可能的。改良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同样痛苦，考验利益损失者的承受力。

最简版总结 3：改良者往往宣传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双赢”过程，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掌权者获得了安全。但后者是个很容易识破的谎言。中国所需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掌权者丧失利益的过程，维稳制度才是保障后者利益最大化。探索改良路径者，必须先承认这个事实，再想方案。

（ bridgeduan：北京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0zber.html ）

【返回目录】



7-7 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
——蔡定剑博士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节选）

“我们发现，决定人们选举意识高和选举行为积极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益因素，其他因素有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无所谓人的素质高低。”



什么是政治，说明白一点，就是公众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就是政治。如果这样来看政治素质，那么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能够意识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参与政治。

很高兴来到我们北京大学作一次关于民主选举问题的谈话。我谈五个方面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通常理解有四原则：即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

马克思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通常理解有四原则：即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是否民主，一般用这四原则来衡量。关于选举的普遍性问题，新中国不像西方国家经过很长的时间来争取普选权。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公民没有普遍实行选举权。但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宣布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基本上实现了普选权，这一点还是比较快地做到了；平等的选举权，过去除了有阶级的不平等，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的代表的代表权不平等。原来在城镇和城市的人大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要四倍、五倍于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现在这个不平等还存在，但缩小了不平等的差距。全面地看，应该说我国的选举没有以金钱为基础，还是比较平等的，这点与民主的要求也问题不大；至于秘密投票的选举现在也基本上做到了；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直接选举。我国直



接选举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现在老百姓只能直选村长，只能直选乡人大代表和县人大代表，所以我国的直接选举的民主程度是很低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选举原则的要求差距很大，与现代世界政治文明潮流也有很大差距。

新中国选举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民主选举制度；1979 年将直接选举从农村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1986 年，开始推进差额选举和完善候选人介绍制度。

建立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个解释，就是虽然过去我们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时提出过民主选举的口号，但是人民着手建立自己的政府时，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好多人还不识字，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中国国家这么大，发展不平衡，一下子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则选举有困难。比如我们实行完全平等的选举，中国的农民太多，一选举就全是农民代表；很多人是文盲，所以只能举手选举等等。所以 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民主选举制度。

到 1979 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历了没有民主和法制的惨痛教训，这时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如在地方设立人大常委会，并赋予地方以立法权；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包括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直接选举从农村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竞选，但规定可以以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说明是可以竞选的；另外还规定了差额选举，规定代表和选民可以联名提名候选人等等。

当时规定的选举制度改革的这些措施是新中国民主的大发展。“文化大革命”后大家都渴望发展民主。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在选举制度改革的这个背景下，北大搞起了竞选，还有湖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地也搞起了竞选。结果搞出了问题，因有的人在竞选时发表“自由化”的言论。所以在 1982 年修改选举法的时候，对有的制度作了改动，如将原来法律规定的“可以以各种方式介绍候选人”改成只能”在选民小组会上介绍候选人”。这个意思就是不可以搞竞选了。虽然有这么一段情况，但是在过去 20 年，我国选举总的是朝民主化方向不断前进。1986

年，中央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一步推进差额选举和完善介绍候选人的制度。1988 年前后的全国五级人大的换届选举中，全国各地出现了选民和代表积极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要求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并要求发表演说的情况。如当时北京市政府领导人选举中，所有的副市长候选人都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代表提名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当选的情况。这次选举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民主选举气氛。

总体上来讲，这二十年来中国选举制度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指导方针下，不断冲破各种观念制度束缚的情况下向前发展。这一点许多在人大工作的人特别是搞选举工作的同志都深有体会。全国人大一步一步地在法律上将选举程序民主化，但实施中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时是斗争，这个斗争是无声的，但有时是很激烈的。这就是同传统的、封建的专制思想和作风斗争。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全国人大本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个方针，对选举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应该说虽然有反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如何确定正式候选人，是选举一个很关键的环节。过去选举确定正式候选人是靠“协商”，于是很多地方就搞“猫腻”，暗箱操作，协商来协商去，最终还是领导上定的某些人入选，协商没有民主程序，随意性就大。1979 年《选举法》就规定了确定候选人要搞预选，预选得票多的人才能作正式候选人。但当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差额，结果有的地方在预选后搞等额选举。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坚持差额选举，1982 年在法律上就干脆取消预选。没有预选，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又有人搞协商。所以，到 1995 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又规定，在确定候选人时可以搞预选，但是，预选必须实行差额选举。你看，一些民主程序的建立都要经过反复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9 年选举制度改革确立了差额选举原则。但是，差额选举并不是很彻底的。法律规定，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选举，副职一律都要搞差额。正职可以搞差额，也可以搞等额。原则是差额选举，只有在提不出候选人的情况下，才实行等额选举。这样一规定，各地提名正职候选人都往等额上靠，而不往差额提名上靠。后来在 1988 年前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不少地方的选举，包括正副省长级的国家机构领导人由组织部门提名的候选人都有落选

的。我曾统计过，有 11 个地方有省级的这种提名落选了，而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针对这种情况，马上就有人提出，说这个要改革，政府的副职领导人不要搞选举了，还是由正职提名，由人大任命就行了。他们找到的理论是西方议会的组阁制。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批驳这种理论。指出，组阁制的前提是有组阁权的这个人必须是真正民选产生的。如果他不是真正民选的话，由他来组阁，这不是把选举制改成任命制了吗？这不是民主的倒退么！我们的正职领导人一般都是等额选举产生的，都由他来提名任命其他官员，这不符合民主制的原理。如果要让正职提名任命副职，正职就必须完全差额选举。这样一说，就没有人再提出副职要批准任命制了。

又如，过去有些地方在选举时，组织者为了能有效地控制选举，不断发明新的招术。如选举政府领导人，法律规定有组织提名和代表联名提名，有些地方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不提前告诉大家，让代表充分酝酿协商。而是搞突然袭击，明天早上选举，今天下午四点钟才告诉大家，说"大家酝酿提名吧！"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代表来酝酿联合提名。如果代表要在不同的代表团联合提名，有的地方还给代表扣上"非法串连"、"搞非组织活动"的帽子。全国人大 1995 年在修改地方组织法的时候，为打破地方的这种操作上的不民主做法，明确规定让代表提名候选人必须提前两天，让大家有时间来酝酿提名。还规定不论主席团提名还是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都只能提出等额名单，不能提出差额。这就是为限制组织上把候选人提满。如果组织部门把候选人的差额都提出来了，那么代表们一看，你组织上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就不提了。选举法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就规定提名只能提应选名额，不能提出差额。

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就是说明，在中国推进民主选举是很艰难的，一些有封建专制思想的人不理解民主，而有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发展民主。可见，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全国人大本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个方针，对选举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应该说虽然有反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987 年《村委会组织法》的制定确确实实跟彭真委员长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彭真的一再坚持，这个法是不可能通过的。



当年搞村民自治制度，实行村委会选举是很超前的，当时怎么能搞起来？我刚好比较清楚这件事的起因和过程。1987 年《村委会组织法》的制定确确实实跟彭真委员长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是他提出要搞这个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力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时常委会讨论这个法律时，很多人不赞成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认为它不利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农村的落实。当时常委会先就这个法律讨论了两次，然后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代表大会更有很多不同意见，不便通过，又授权常委会通过，前后折腾了四次。那时一个法律一般在常委会上讨论一次就通过。为什么这个法讨论这么多次？就是反对的人不少。

彭真为什么会提出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的问题？彭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主管政法的一位领导人，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第一批受害者，被投入监狱达 8 年之久。“文化大革谩鸨以后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彭真是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里面在民主法制方面反思比较深刻的一个，有很多加强民主法制的主张。当时他为通过这个法，专门有个讲话，他说：中国搞民主，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在上面，从我们中央来讲，是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下面要搞村民自治，让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让农民能够直接管理自己身边的事情。中国九亿农民如果自己身边的事都管不了，谈什么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他提出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的主张，在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很超前的，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法会把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基础搞掉。

这个法律虽然在 1987 年勉强地通过颁布，当时为了让一些不太赞成的人投赞成票，在法的后面标了一“试行”的尾巴。法律通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默默无闻。当时我认为，这个法只要先制定出来，一时实施不了也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的。我在 1988 年写过文章，谈如何实施村委会组织法。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制度确立以后，民政部先在个别地区搞试点，首先是在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通过试点、推广，村民选举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才广泛得到承认、发展。到 1998 年，民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村民民主选举和自治的经验，全面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将实践中创造的一些好的制度都充实进去了，这个制度已经作为中国的”草根民主”逐步扎根开花。



民主的选举会有副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抑制，很有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选举和扼杀选举。比如在农村里用金钱来控制选举、家族势力和暴力行为等等已经出现。有些人就会以这个理由来反对选举，说选举会把农村搞乱、会影响社会稳定云云。选举造成混乱的情况历史上有过，现在也有少数国家为选举暴力和黑金所困绕。但那是少数无能的政府，是选举不公正造成的社会冲突等等。真正民主、公正的选举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已被证明是政治文明的杰出成果。如何看待利弊，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措施将选举的弊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要面临的课题。

决定人们选举意识高和选举行为积极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益因素，其他因素有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无所谓人的素质高低。所以不能说大学生的选举、民主素质就比农民高。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民主，扩大直接选举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搞扩大直选，这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搞得不好会把中国的社会搞乱——这是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理论。这种理论在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老百姓中普遍都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的这个理论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近代史上的许多伟大的精英领袖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有这样的思想，他们在主张民主、宪政的时候，都看不起老百姓。康有为说，给臣民太多的自由民主权利不行，犹如“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窬墙飞瓦”。孙中山说，中国老百姓不知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他们便目中无人，胡行乱为。都认为百姓的素质太低，而不相信群众。结果民主、革命都不成功。

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个理论进行考究一番，这也是我们曾组织一场关于中国选举问题调查的重要出发点。我们组织了十多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工作，调查的出发点是从公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政治因素、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角度来了解不同的人的选举意识、选举观念和选举行为有什么不同？从而得出了一些结论。

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选举行为，它与公民素质、经济水平等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分析来看，有的结论与我们想象的是一致的，而有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公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意识和行为的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抽象上选举的积极性会高一点。还有政治因素，如党员、国家机关的干部，一般来说选举的积极性表现得会相对高一些。但是，我们对许多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调查都表明，农民

的选举参与意识比城市市民的选举意识要强，比大学生的积极性要高。这个调查结论不是一二个数据表明的，而是很多数据，从不同的角度：无论是选举意识，选举参与程度，对选举改革的态度等等方面，农民都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的积极性要高。大学生的选举参与程度比农民的要低，还包括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大学生是一个理想型、观念型的选举群体，对选举来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他们对选举的民主程序和政治环境感兴趣，如果他们认为政治环境宽松，选举程序民主、公正，而且能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他们会对选举有兴趣、会积极参与。如果他们认为选举程序不那么民主，他们会很不感兴趣，对选举比谁都冷谈。而农民对选举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是因为近年来农民通过村委会的选举，看到了选举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也刺激了他们的选举意识。我们发现，决定人们选举意识高和选举行为积极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益因素，其他因素有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无所谓人的素质高低。所以不能说大学生的选举、民主素质就比农民高。也许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利益。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老百姓会踊跃投票。说他们不关心选举，没有选举热情和能力是没有根据的。

这就引起我对什么是政治素质、政治觉悟问题的反思。如果大家把政治素质看成是政治知识、政治理论，那确实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高。但为什么实践中知识分子比农民还不愿去投票？什么是政治，说明白一点，就是公众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就是政治。如果这样来看政治素质，那么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能够意识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参与政治。对选举来说，人们看到利益所在就会积极投票，看不到利益所在就不会积极投票，任何人都一样，无所谓素质高低。关键是让不让他们参与和给不给适当的途径参与，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对选举就会有极大的热情、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蔡定剑：中国著名宪政专家，原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3-03/07/content_764030.htm ）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陶郁："素质"与民主参与——以中产阶级为例

"素质"与民主参与到底有没有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一则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窥探一角。

这则研究表明：与中国社会里的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级更加关注政治，也更积极地采用非正式途径和个人行动来解决与政府或官员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中产阶级的公民参与程度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在面对体制侵害时也未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大的抗争勇气。

长期以来，诞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推动政治体制发展的厚望；而中产阶级热心参与公共事务、要求政治变革的案例，不仅出现在传统发达国家云集的西欧和北美，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广泛发生于经济水平起步相对较晚的拉美、东亚和东欧。

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率和社会流动程度也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许多人因此断定，这个迅速崛起的"高素质"阶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

既有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坚定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他们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政策；然而，中产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也常受到来自不法官员的侵害，因而从理论上说他们应当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动力。

不过，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实证研究并不非常充分，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就更加有限。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唐敏在《中国政治科学期刊》上发表



文章，通过分析经由“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所采集的统计数据，将该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唐敏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既参考了既有文献中的习惯性处理方法，又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操作化。既有的文献通常采用收入、职业和主观阶级认知等指标来识别某位社会成员是否属于中产阶级，考虑到中国各地收入和购买力水平差异显著的事实，唐敏采用职业和主观阶级认知作为主要识别标准。

唐敏认为，中产阶级成员应当从事新兴职业、具备不同于传统社会观念的新价值，并且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以支撑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白领。这类人员在全部三千多个有效样本中约占百分之十二。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哪些政治特征呢？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唐敏发现，在控制年龄、性别和政治面目的情况下，较之于中国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中产阶级更频繁地收听和收看与政治相关的报道和节目，他们也更加经常地谈论政治；但当他们面临麻烦和问题时，却更倾向于与主管官员进行个人沟通，通过人脉动员所能找到的干部帮助自己。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不同，较之于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诉诸正式制度的政治参与和要求变革既有制度的政治行动并不更加热心。唐敏发现，统计数据说明，中产阶级在面临问题时，并不会比其他阶级更加积极地使用诉讼和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正式制度所提供的渠道，也并没有更大的勇气去采用抗议和静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工作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意见，同时，他们也并不倾向于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迫使利益相关者改进选举程序。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更加关心政治，但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却更倾向于个人化与非正式的解决方式呢？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更为赞赏民主理念，但对于能够推动体制变革的实际政治行动却并更加积极和活跃呢？

唐敏认为，这首先可能与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关。在当今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当中，虽然正式制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渠道，虽然正式制度本身也在变革发展，但人们还是认为个人关系

等非正式制度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是担心参加推动制度变革的集体行动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因此，素质较高的中产阶级虽然更为关心政治，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却并不更高。

同时，唐敏也认为，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能够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受益，至少他们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核心利益在既有制度下还未受到严重的侵害。因此，在唐敏看来，期待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研究中一些控制变量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也非常有意思。无论在中产阶级还是非中产阶级内部，人们的年龄越大，就越倾向于关心政治但减少对于抗争性活动和选举的参与；男性比女性更加关心政治，更容易参加选举，也更积极地通过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抗争性方式解决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冲突；党员更关心政治，更积极地参加选举，但在解决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冲突时，则更不倾向于使用较为激烈的抗争性手段。

【参考资料】

Tang, Min. 2011.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4): 373-87.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weibo.com/cochina ）

编辑：黄隽咏 刘垚 黄雯怡
校订：黄海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舒欣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